



CAIZHENG WENTI TANSUO

财政问题探索

CAIZHENG WENTI TANSUO

申长平 /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CAIZHENG WENTI TANSUO

财政问题探索

CAIZHENG WENTI TANSUO

申长平 /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财政问题探索 / 申长平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8

ISBN 7 - 5058 - 5717 - 7

I. 财… II. 申… III. 财政 - 文集 IV. F8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0294 号

责任编辑: 王东萍

责任校对: 王肖楠

版式设计: 代小卫

技术编辑: 李长建

财政问题探索

申长平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036

第三编辑中心电话: 8819130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bj3@ esp. com. cn](mailto:esbj3@esp.com.cn)

北京密兴印刷厂印装

880 × 1230 32 开 12.375 印张 310000 字

2006 年 8 月第一版 200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 - 5058 - 5717 - 7/F · 4976 定价: 2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责任编辑◎王东萍 封面设计◎王 坦



作者简介

申长平，男，1955年2月生，汉族，山西省平顺县人，中共党员，教授。1978年毕业于山西财经学院，留校任教。自1987年至1995年，先后任山西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副主任、主任；1996年调任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校长、党委副书记至今。被聘为山西财经大学硕士生导师、山西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山西省人大财经委决策咨询专家、财政部教材编审委员会财税专业组副组长、山西省会计学会副会长、山西省财政学会副会长等职。

申长平从事财政、金融、税收、财务教学及科研近30年，主编、参编教材、专著18部；参与并执笔1项国家课题，主持10余项省级课题的研究；公开发表论文90余篇；许多观点在财政理论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多篇论文获省部级奖励。先后被山西省政府授予山西省优秀教师称号；被山西省科委等八部门共同授予山西省青年科技奖和山西省青年教学专家称号；1995年被国内贸易部评为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管理专家；1999年被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0年荣获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

自序

我于1978年毕业于山西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留校任教。不久，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中国大地。知识阶层尚无现在的浮躁之风，有的是对改革的高度关注，对改革成功的向往，对祖国美好未来的企盼，以及对改革中遇到和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的认真思考、热烈讨论和潜心探索。作为一位青年教师，一方面由于教学本身的需要；另一方面基于对财经理论的浓厚兴趣；再一方面在于改革的吸引和召唤，我开始了对一些财政经济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可以说，我的思考是与改革同步的，我的文章与改革紧密相连。转眼20多年过去，陆续写下了数十篇有关财政经济问题的文章。本书是这些文章中的一部分。

结集出版自己的文章，是出于几点简单朴实的想法：一是不管这些文章质量高低，我都为它付出过心血，流淌过汗水，散落在各种期刊上，就像自家的孩子寄养在别人家里，集中在一起，心里会踏实许多。二是从1995年起，我开始担任山西财经大学的硕士生导师，并给研究生讲授《财政理论》课程，介绍自己的一些观点时，学生们查找原文有很大困难，集中在一起会为学生提供很多方便。同时，当学生们看到这些文章时，虽然未必对他们的老师产生崇拜，至少让他们感到老师并非不学无术之徒、徒有虚名之辈，或许能起一些为人师表作用。三是这些文章的内容和观点，自认为直到目前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不管别人是否接受，

自己应当相信自己。

“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是我恪守的古训。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推动和指导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是空头理论，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这是我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认识。可以无愧地说，这些文章都是独立思考或者共同切磋的成果，并力求有的放矢、有所超前、有所创新。我非常认同著名财政学家王亘坚教授的观点：科学研究贵在创新，著书立说是极为严肃的事，没有独立见解的文章、没有创新价值的文章、没有考虑成熟的文章，写不如不写，发表不如不发表，这样的所谓成果，对自己是滥竽充数，对别人是误人子弟。

实践是最伟大的检验师，时间是最公正的评判家。我愿意将这些文章交给实践和时间去检验和评判。当然，我也诚挚地欢迎学界同仁的批评。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何振一教授。在我的学术生涯刚刚开始时，有幸与何老师结识并受到他的欣赏和器重。在1982~1996年的十几年中，我多次当面聆听他的指教，我们多少次书信、电话来往，有些信件我至今保存。何老师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严谨缜密的思维、追求真理的精神、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极大的影响。他是我当之无愧的导师。1996年调任现岗位后，繁杂的行政事务极大地干扰了我的学术研究，也影响了我与何老师的交流，但却不能阻碍我对何老师的感激和思念。我还要感谢我的学生郝成秀同志，他作为我教过的第一批本科生，留校后与我成为同事，数年间，我们互相切磋，共同探讨，20世纪80年代的大多数文章是我们合作的成果。

成书之际，每篇文章前面写一简介，既有文章的提要、社会评价，也有一些新的思考和补充，不愿通读全文者，看一看简介足够了。

申长平

2006年5月于山西财专

目 录

财政起源的历史考察	/ 1
财政起源的原因管见	/ 13
试论财政分配形式的社会性	/ 23
试论作为财政分配目标的社会共同需要	
——兼答“国家分配论”及其他各论者的一些质疑	/ 34
社会共同需要属于社会存在是可以把握的	
——与邓子基、张馨同志商榷	/ 49
试论我国社会主义财政管理体制的概念、范围及其实质	/ 57
为《试论我国社会主义财政管理体制的概念、 范围及其实质》一文答疑	/ 66
试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财政的两个新特点	/ 75
论国家职能与财政职能	/ 86
市场经济与财政职能转变	/ 105
市场经济与财政宏观调控	/ 121
收入分配与财政调控	/ 139
经济效率、社会公平与财政分配	/ 151

- 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问题的探讨 / 172
- 调整与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浅见 / 189
- 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预算外资金”应当分解 / 200
- 财政赤字与公债关系的几个问题 / 211
- 承包制规范化的几个问题 / 219
- 国际收支调节与财政政策 / 229
- 我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财税对策 / 237
- 科技进步与财政 / 260
- 教育发展 with 财政 / 277
- 试论充分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 / 291
- 完善我国税制结构的探讨 / 301
- 偷漏税问题及我国公民的纳税意识 / 320
- 谁负担了价内税 / 330
-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 / 336
- 住宅商品化的主要形式
——出售还是出租 / 354
- 论事业单位的经济核算 / 359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思考 / 375

财政起源的历史考察

【文章简介】 本文认为，财政分配关系是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共同需要而产生的。它是从统一的生产单位直接分配活动中独立出来的，并且由执行社会公共职能的社会组织所进行的一种分配活动。本文通过大量历史资料的考察，证明原始部落时期，财政分配活动已经形成。财政关系的发展是国家产生的前提，国家只有在一定的财政支持下才能产生并存在，而不是国家的产生决定了财政的产生。但是，自从国家产生之后，财政就与国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国家是社会的正式代表，是公共权力的执行者。概而言之，国家没有也不能产生财政，但国家必然会执行财政分配职能。

财政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它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是什么？乃是每一位从事财政理论工作的同志必须首先明确的问题。也是从事实际工作者应该了解的问题。建国以来，大多数同志认为“财政的存在是以国家的产生为前提的”，^①它是“出现了国家以后才产生的”，^②并认为“税收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财政范畴”。^③

① 《财政理论研究》上海财经学院编，1980年11月版，第223页。

② 《社会主义财政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1页。

③ 同上书，第94页。

通过对一些历史资料的初步考察,我们认为国家产生论的观点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分配只能是生产的一种产物。“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互相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① 国家产生论观点,恰恰在这历史唯物主义问题上,本末倒置。我国财政理论上好多年争论不休、明辨不清的问题,与国家产生论的错误结论有密切关系。因此,非常有必要对这个财政理论中的基本问题作一番考察。现将我们初步研究探讨的结果加以概括,并以此拙文就教于财政理论界以及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们。

值得提到的是,对本题目的论证,需要大量的、科学的人类成文史前的资料,需要国家产生前人类所走过的各个主要时代及其各个阶段的一般经济条件 and 政治情况的权威科学的定义和结论。19 世纪中期的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对此进行了长期的极为杰出和富有成果的研究。因此,在这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 19 世纪末叶到 20 世纪初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保尔·拉法格的《财产及其起源》是重要的资料来源及证明。

一、部落财政的产生

希腊“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② 截至目前,无论是从历史的统一性看,还是从历史资料的完整性看,研究财政的起源,也再好莫过于从古雅典着手。摩尔根先生不但给人类的史前文化建立了一个确定的系统,而且证

①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 25 卷。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15 页。

明：“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内部用动物名称命名的血族团体，实质上是与希腊人的 *genea*（氏族）和罗马人的 *gentes*（氏族）相同的……上古时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的全部社会组织，跟美洲印第安人的组织极其相似；氏族直到野蛮人进入文明时代为止，甚至再往后一点（就现有资料而言），是一切野蛮人所共有的制度”。^① 这样，我们就可以借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加上后来保尔·拉法格对氏族公社时代财产方面的进一步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打开史前各文化阶段特别是希腊“荷马时代”前的经济文化宝库的钥匙。正如摩尔根所说过的，在美洲印第安人那里发现的东西，很可能在那些处于同一发展时代、同一条件的其他部落也会存在。这样，我们借助于摩尔根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研究材料，对古雅典氏族进行分析研究是完全适合的，从美洲印第安人那里得来的结论，同样适用于古雅典。

在距今大约 50000 年前，地球上一些主要民族的人类相继走过了蒙昧时代的低级、中级、高级阶段和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步入了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②

“在此以前，野蛮部落依靠狩猎和采集为主，除了间或有犬之外尚无任何一种驯养的动物，他们沿着河海岸的陆地流落转徙，哪里发现有丰富的食物，就在哪里停下来……在他们那里，农业还处于萌芽状态，他们大部分还得依靠自然提供他们的果实、鱼和兽。”^③ 仅有的少量土地完全是共同占有，共同耕种。^④ 对产品的分配是纯粹的原始共产主义式的。“公共设有公共仓库……在打猎捕鱼中或由种地取得的一切，都放在公共储藏室里，家里人员都是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15 页。

② 指野蛮低级阶段，更前的时期则不必说。

③ 法拉格：《财产及其起源》，生活·新知·三联书店 1978 年 5 月版，第 51 页。

④ 同上书，第 55 页。

公共的存货生活的”，^① 每顿就餐，都是由主妇“按照每个家庭的需要把食料分配给各个家庭”^②，部落（或氏族）政府的首长同其他氏族成员一起共同参加劳动，他（他们）既是管理者，又是劳动者。尚未出现专门从事管理部落行政事务的人。在宗教领域中，也仅发生了自然崇拜和关于人格化的神灵以及关于大主宰的模糊概念。^③ 尚未产生专门从事敬神和祭祀的僧侣。大家都是劳动者，又皆是消费者，人们过着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半饥饿生活，除了个人的消费之外，根本谈不上其他消费的需要。

虽然这时已经出现了战胜者从被征服的部落中勒索贡物的事（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第2编第5章明确叙述过此事。当时，处于野蛮低级阶段）。但是，在这种纯粹的原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对于粗野的战士们来说，贡物的取得同在猎场上获得猎物和在土地上得到收成完全一样。贡物放到公库里，大家共同享用，分配形式完全是原始的初级的分配。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约到了公元前48000年左右，属于草原上的野蛮人发现了可以驯服和驯服后可以繁殖的动物，畜牧成了主要的经济活动，而在适宜于发展农业的地区，牧草栽培和作物种植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畜牧业农业的发展，使人类社会实现了第一次劳动大分工，也促进了手工业技术的不断改进。”^④ “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⑤

① 《原始社会》1972年版，第30页。

② 同上书，第30页。

③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78年4月版，第54页。

④ 固一良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3年1月版，第28～2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页。

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原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一系列深刻的变化，“氏族共产主义让位于因血统而联系起来的若干家庭的共产主义，于是就出现了血族集产制。”^①“土地仍然是公有的（即所有权），但土地的占用、耕种以及产品的消费已经不再是由全氏族来共同进行了。收获一年一度在氏族的所有分开了的家庭之间进行分配。每一家庭耕种自己的一块土地并单独占有靠独自劳动所获得的产品。”^②“当秘鲁被征服的时候，其居民已进入家族集产的阶段。代替土地的共同占有和共同耕种，他们每年按村落中的家庭进行分配。可是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约2/3要保留给他们的太阳神和印加斯（INCAS——秘鲁印第安人的首领）。这些土地是共同耕种的。收获用于满足祭祀、印加斯和行政机关的需要；余下的部分则用于公益事业和按需分配给居民”^③。马克思在谈到野蛮中期的财产问题时写道：“土地还是部落共有，但此时已有一定部分划分出来作为维持管理机构之用，另一部分，则划分出来作为宗教方面的使用，而最大一部分即供养居民大众的部分，则在各氏族之间或住在同一村落的公社之间分配。”^④

根据以上两段权威性的论述，加之后来历史科学、考古学和民族科学的一些新成果，可以证明：（1）在野蛮中期，财产关系发生了变化，生产资料（游牧部落主要是畜群，农业部落主要是土地）已逐渐从部落或氏族的共同占有变为各个家庭家长的财产，

① 这里的家庭不是由一对夫妻而是由血缘关系密切的许多夫妻组成的。拉法格称这种财产形式为血族集产制，是用来区别于其所来源的原始共产主义。

② 这里的占用，即占有权，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谈到野蛮中期的经济情况时说过的。法拉格：《财产及其起源》，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5月版，第63页。

③ 太阳神：是印加最高的神，所谓太阳之地，实际上是属于管理部落的祭司。法拉格：《财产及其起源》，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5月版，第49页。

④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78年4月版，第57页。

原来意义上的原始共产主义被破坏了；^①（2）由于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展，部落（或氏族）行政事务较前大大增加，部落首领已逐渐脱离了生产，同时也出现了其他一些专门从事部落行政管理的人。“按教阶组织起来的，有着服装特点的僧侣制，人格化的神和代表他们的偶像……也首次出现于这一时期。”^② 这些部落僧侣一般是由某个氏族的氏族长兼任的。即所谓原始时期的僧政合一。这些非生产人员的出现，就必然产生对社会产品的需要，即所谓维持管理机关和执行共同职能的需要。而这种需要来源于剩余产品并通过部落政府进行分配得以实现。于是，从第一次的、原生的分配中产生了派生的分配，即财政分配发生了。当然，这仅仅是财政分配的萌芽。（3）这种满足部落首领机关和其他共同需要的产品，以氏族成员在公田上共同劳动而获得产品的形式实现，即所谓的力役形式。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贡物。这些贡物是氏族成员自愿向酋长、头人和假想的鬼神贡献的，这些贡物自然由氏族首领接纳而且也自然由他们耗费了。可见。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财政范畴不是税收，而是力役和纳贡。

二、“荷马时代”的希腊财政

随着社会生产日益迅速的发展，大约在公元前 24000 年末至 12000 年初，人类走过了野蛮中级阶段，跨入了野蛮高级阶段。对于希腊人来说，便是步入了“荷马时代”。通常，人们将这个阶段称为军事民主阶段。这里，“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这两篇世界上流传至今的最古的文学文献和《史诗》，将为我们提供极生动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57 页。

②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4 月版，第 56 页。

有力的证明。

在野蛮高级阶段，由于铁的发明和应用，以及在此期间发生的社会第二次大分工，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财富在迅速增加，但这是个人的财富”。^① 随着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在希腊人中间（尽管）一部分土地还是部落共有，另一部分则是为了宗教上的目的为胞族所共有，第三部分为氏族共有，但较大的一部分土地已转为个别私人占有。”^② 正如恩格斯所说“耕地起初是暂时地，后来便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③

在这种情况下，执行社会共同职能的部落政府的情况如何呢？“民族的军事首长——勒克斯、巴赛勒斯、提乌丹斯——成了不可缺少的常设的公职人员”。^④ 而且，这些首长住着豪华的宫殿，那里一切都是辉煌灿烂：“这儿，那儿，展着一堵一堵铜制的墙，从门窗到内室，周围是绀青的飞檐；黄金的门户，深锁着那间庄严的宫殿；白银的柱子，高踞在黄金的门阙上面；顶上是银制的门楣，下面有黄金的兽环，门前左右站着金铸的和银铸的彪犬，是艺神用神工鬼斧的技巧雕成的精品，把守着慷慨好客的阿尔客琉斯的宫殿。它们真是长春不老，千秋不朽的东西。室内放着一排一排的靠椅，从门阙直到室内。椅上放着柔软的绮罗。精工巧制，这是妇女们的玩艺……”^⑤ 而且，巴而琉斯的宫廷，常常挤满无数的从属（同僚和战友），一群群的亲属戚故、宾客知己大量消耗着宫廷的物产。此外，从《史诗》上可以看到，部落人口急剧增加，行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9页。

②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78年4月版，第6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页。

④ 同上书，第160页。

⑤ 奥德赛卷7，86~97行译文从希腊原文。

事务日益繁杂，部落或部落联盟机关里的非生产人员大为增加，甚至出现了所谓“传令兵”。^①

与此同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个相对独立的公社之间，氏族之间甚至部落之间便形成了某种共同利益，如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等。部落、部落联盟政权机关是这些共同利益的维护者、组织者。为了执行社会经济职能，满足共同利益的需要，部落、部落联盟政权机关必须从各个基本的经济单位中集中一部分人力、物力、财力来满足这种公共需要。这样，我们看到，需要部落（或联盟）财政分配的范围明显地扩大了，分配的数量显著地增加了。显然，这种增加起来的财政需求，单凭以前主要地依靠在“公田”上收获的产品和为数不多的贡物是难以维持的。那时，国家尚未产生，按照恩格斯的研究成果，还未出现捐税，就是说，“荷马时代”的希腊部落政权机关还未学会从各个经济单位里征收产品。那么，满足公共需求的产品从何而来呢？我们从史诗和其他一些资料中看到，这时专门为了掠夺财富和让被征服部落纳贡的野蛮战争加剧了。为了获得贡物，野蛮人不惜到很远的地方去做战，由于自然环境的优越，希腊人也常常出海掠夺，成为史前有名的海盗。而这时掠夺来的东西，大部分被部落首领占用支配。

这样，我们看到，在“荷马时代”希腊部落（联盟）的财政收入由以下三部分组成。（1）从野蛮中期一直保存下来的力役形式；（2）比以前数量大为增加，因而显得非常重要起来的“贡物”，包括氏族成员缴纳的和被征服的部落被迫缴纳的；（3）掠夺来的财物；（4）本身的收入。即巴而琉斯田庄收入。

我们之所以把巴而琉斯的田庄收入也看作是财政收入的一个内容，是因为“荷马时代”的部落首领和氏族首领占有较普通成员大得多、好得多的土地，《史诗》上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些贵族首领

^① “伊里莱特”卷2，96行，541译文从希腊原文。